

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丛书

黄书光 主编

刘静 | 著

走向民间生活的
明代儒学教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丛书

黄书光 主编

走向民间生活的
明代儒学教化

刘静 |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 / 刘静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12

(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丛书 / 黄书光主编)

ISBN 978-7-5444-5568-8

I. ①走… II. ①刘… III. ①儒学 - 教育 - 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B222.052.6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5114号



责任编辑 谢冬华

书籍设计 陆弦

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丛书

黄书光主编

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

刘静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4-5568-8/G·4494

定价 57.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自身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为社会发展对教育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表现为教育变革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从社会发展对教育变革的决定性影响来看,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等,几乎都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与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与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则主要指学校教育。不同形态的教育体系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也对社会发展发挥各自的独特功能。因此,要全面研究教育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关系,不仅要研究教育的常态形式——以未成年人和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学校为核心的制度化教育体系,及其在与社会其他要素的相互联系中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更要分析以普通民众为教育对象、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存在的教育形态——社会教化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历程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与制度化的教育体系相比,社会教化虽然在组织形式上不那么系统、规范,却是坚韧而有力、持久而绵长的,于悄然无声中实现对社会人心的凝聚与整合。

关于研究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宗旨,我们既需要在教育历史演进的视野中考察教育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需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深度诠释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多元互动。基于此,本丛书本着“史料为重,史论结合”的立场,采用历史叙事、逻辑分析、理论比较、个案解剖、文化反思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辩证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探讨不同形态的教育在社会历史变迁长河中的微妙演化,以期在更高的层面认识并把握社会发展的教育动力与教育发展的社会根基。本丛书由5本著作组成:(1)《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黄书光等著);(2)《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刘静著);(3)《新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马云著);(4)《社会变革中的中国高校德育转

型》(许瑞芳著);(5)《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教育动力》(黄书光等著)。这5本著作均相对独立,个性鲜明,而且彼此关联,整体贯通。其中,既有对当代社会变革中的教育形态——“高校德育转型”与“农村扫盲教育”之求索,又有对传统社会变迁中的典型教化——“明代儒学教化”之探究,以及对“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的关切与深思,还有从宏观视角来叩问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背后的“教育动力”问题。

上述著作的撰写者都是教育史专业的教育学博士,大多已是教授或副教授。面对共同的专业学术理想,我们都能矢志笃敬、潜心学问,对教育史专业的学术前沿抱有浓厚的探究兴趣。诚然,每个人的学术兴奋点和所关注的学术热点不尽相同,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相互鼓励与切磋,并通过多次的小型学术沙龙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各自的学术见解,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达成了彼此的学术共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选择的研究主题和所探究的具体问题毕竟是前人较少涉猎的领域,这给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学术挑战,需要我们以百倍的努力去勇敢面对。我们所阅读的史料和论著是否确当?所采用的视角和方法是否得当?所把握的问题和旨趣是否适当?所分析的理路和结构是否精当?凡此种种均逃不出读者诸君的敏锐眼光,真诚地期待并感谢热心读者、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

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丛书出版之际,特向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编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2013年10月16日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明代儒学教化研究的缘起	3
一、研究的视角、方法及资料	3
二、已有研究成果	7
第二节 儒学教化研究基本概念的诠释	9
一、教化与教化权力	9
二、儒学教化与儒学的三种形态	13
第三节 明代儒学教化的研究背景及总体描述	15
一、文化与思想史的背景：朱学与王学教化思想的比较	15
二、明代儒学教化的总体描述	20
三、本书的基本框架	22
第二章 学校组织与儒学教化	25
第一节 官学与儒学教化	27
一、学校：道理之原与教化之本	27
二、教材：被“编修”的儒家经典与“家孔孟户程朱”的教化企图	32
三、以夏变夷：边疆与偏远地区的儒学教化实践	38
四、学校与地方社会：叙彝伦，美风俗	40
第二节 书院与儒学教化	43
一、书院的兴衰与学术下移	43
二、书院的发展与乡俗教化	47
三、家族书院与地方社会教化	54
第三节 社学与儒学教化	56
一、社学：乡间里巷的儒学教化	56
二、社学的办学情况	61
三、社学与乡村教化权力之争	65
四、边疆地区的社学	68
五、义学、塾、馆的社会教化之功	70

第三章 儒学教化的社会网络	75
第一节 家规族法与儒学教化	77
一、家规族法中的儒学教化	77
二、国家与宗族：关于教化权力的讨论	89
第二节 乡约与儒学教化	93
一、官办乡约：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实践	93
二、民办乡约：以地方绅士为核心的乡村自我教化	98
三、乡约与保甲结合：道德教化与惩戒	100
第三节 仪式、象征与儒学教化	102
一、仪式与象征的儒学教化意义	102
二、乡饮酒礼：道德的盛宴	105
三、儒学象征体系：对先贤的纪念与标榜	108
四、民间宗教对儒学教化的挑战	110
五、坊、乡的命名：社区的教化符号	113
第四节 道德的审判：民间诉讼与儒学教化	117
一、“非礼则无法”：明代礼与法的辩证关系	117
二、“教化为先”：成讼前的道德干预	120
三、“教谕式调停”：民间诉讼的儒家化审判	122
第四章 通俗文艺与儒学教化	131
第一节 社会文化与通俗文艺	133
一、官方的态度：坚决的压制与暧昧的喜爱	133
二、民间的态度：支持与反对	137
第二节 小说：儒、释、道外的“第四教”	146
一、说书：智俗共喻的教化方式	147
二、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的传播	151
三、通俗小说与儒学教化	155
第三节 戏剧：“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	161
一、官方戏剧：“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	162
二、乡村戏剧：“寓教于乐”	167
三、“反教化”的市场戏剧	171

第五章 官绅与儒学教化	175
第一节 地方官与儒学教化	177
一、地方官：“转移化导”之责任	177
二、教官：儒学教义的传播者	186
第二节 绅士与儒学教化	191
一、文人讲学与儒学意识形态的传播	192
二、乡绅：儒家伦理的“卫道士”	197
第六章 儒学教化视野下的妇女与儿童	209
第一节 儒学伦理与闺门教化	211
一、家庭教化：“三从四德”	211
二、社会教化：无名者的贞节牌坊	220
第二节 蒙以养正：儿童与儒学教化	229
一、家庭对儿童的教化	229
二、塾、馆里的儿童教化	236
三、多样化的蒙学教材	238
第七章 琼州与吴县的儒学教化比较：以地方志为基础的考察	245
第一节 “化外”海岛：琼州的儒学教化	247
一、学校：儒学教化的核心机构	248
二、塔形绅士结构与地方儒学教化	254
第二节 “江南望邑”：吴县的儒学教化	261
一、完善的学校教化体系	261
二、绅士：下层绅士为主的教化群体	267
第八章 结语：教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277
一、明代儒学教化的宿命：教化与异化	279
二、明代儒学教化的实践智慧：成功的基层文化实践	283
三、全球化视野下儒学教化的现代使命：高尚人格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285
主要参考文献	289
后记	305



第一章

导论

儒学教化是指儒学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向基层社会渗透,获得其民间形态的过程。明代(1368—1644年)儒学教化网络的广阔和严密程度大大超过前代,其中,官方与民间、精英与民众、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复杂地交集在一起,展露出儒学思想与社会制度之间多样化的复杂关系。本书将以明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县形成的教化空间作为观察点,把探寻的目光投向那些不知名的坊间村落,意在探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的价值观是如何传播于基层社会,影响庶民日常生活的。

第一节 明代儒学教化研究的缘起

儒学教化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需要用历史的望远镜将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变迁纳入研究的视野,同时它更是一个与庶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具体问题,因此,还要用历史的显微镜去观察乡村里的某一所社学的讲堂以及草台上的某一次戏剧演出。儒学教化又是一个文化实践的过程,是儒学思想向社会生活渗透的过程,因此,既需要厘清明代儒学教化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和学术发展脉络,更需要通过对多样化史料的采集与深入解读,具体而生动地诠释明代儒学的民间姿态。

一、研究的视角、方法及资料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其他的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① 这些变化使历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的状态。历史学的主题正变得越来越“民主化”与多样化。传统的历史学把焦点投向那些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和重要事件,而历史主题“民主化”的趋势则把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情境推上了历史叙事的舞台。以往在史书中难觅踪迹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登场了,他们的日常生

^① [美]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中文版序言,3.

活文化成为历史学家们关心的对象。这些历史研究的新观念在社会史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本书将借鉴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社会史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呈现下层和上层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和什么样的环节上建立起他们合理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又如何返回到现实中”。^①这就要求社会史研究必须“走向民间”，必须关注下层社会、大众文化、小人物。但是，历史研究若只聚焦于小人物，缺少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关注，同样显得目光狭隘，且有流于只关注“轶闻逸事”之嫌，这就会脱离历史学的轨道，因为单凭一个人的故事无法让读者了解真正的个人，更无法窥视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家，他的目的不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增长智慧。个体只能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才会被理解，因此，普通人及其生活的历史，只有在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的观照下才会得到合理的诠释。所以，历史研究者必须在宏观与微观的层次之间不断穿梭，交替使用望远镜与显微镜，才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生动和深刻，才能更真切地揭示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多元互动。

“民间生活”是本书的一个关键词。民间一般与官方相对、相应，民间生活主要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即庶民生活。说到生活，总是会让人联想到日常起居、柴米油盐等具体的事物，这些都是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正如梁漱溟先生曾说过的“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与生活相比，文化似乎有点抽象，不那么具体可见，但是，要深刻地认识民间生活，就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比如儒学，作为一种学术存在，它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研习的功课，但当它指向社会，指向普通人的生活并成为日常行为的范导时，则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是企图用儒家文化去“化民”的，他们希望庶民的“生活的样法”与儒家文化倡导的相一致。教化是他们达到其目的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本书虽然关注的是明代的民间生活，是社会基层的文化实践活动，但力图说明的却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即儒学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于民间庶民生活，如何影

^① 杨念群.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0.

响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

这里涉及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和“儒学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普通人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来自哲学教科书。近年来，“意识形态”成为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初步建立起“思想”与“制度”特别是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历史由此被纳入到了内外互动的诠释框架中而拥有了世界史视野”^①。但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因此，“这种思路的引入曾大大影响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品格”，并成为奠定整个中国史学界“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大阐释传统的重要基石。粗略地说，这种基本品格预设了中国历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所有上层建筑部分基本都起着负面作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进步科学的产物。^②认为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起负面作用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模糊、众说纷纭的概念，“是一个浸透着情感、充满了幻想、关系到行动的，有关人类与社会、合法性与权威的，从日常与习俗性的强化力量中获得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信仰总是具有或多或少的凝聚力、或多或少的表述力，和对外部信息的或多或少的开放性。意识形态在动员、操纵、控制大众方面具有一定的潜能，因此，意识形态也常常是被动员起来的信仰系统。”^③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不是把儒学意识形态看做一种“负面”的代表“封建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而是将其看做一套信仰与价值体系，是儒学思想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若本书只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关注包括王朝的政治结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发展在内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本书在资料选择上力求有所突破。除参考正史资料外，本书以地方志作为主要的研究资料，同时广泛采用家谱、笔记以及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等其他相关的资料。与官修史书相比，这些能够具体生动地反映明代民间生活样态的资料

①② 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6。

③ Mostafa Rejai, "Ideology",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Philip P. Wiener, Vol.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73, p. 558. 转引自：季广茂，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

可以更加深刻、细致地说明儒学教化的实际状态。

地方志是关于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以及民间生活的记述。与其他官修史书相比,它关注的是地方社会和民间生活,那些无望在官修史书上留名的地方人士,如果在知识或道德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称得上是民众学习的榜样,或曾积极参与地方文教和公益事业的建设,我们往往可以在地方志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有幸被朝廷旌表过,那被收入地方志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纂修地方志对地方文人士绅来讲,不仅是一项文化事业,更是维护地方风教的重要举措。如万历年间新昌知县田瑄则直接把地方志的纂修看作是推行儒学教化的手段,在其亲自纂修的《新昌县志》的略述中有如下一段话:

赋役既均,家国殷富,然后教化可施而学校建焉。学校者,礼义之所由兴也。而祀事、典籍、书院、社学皆其具也,故类载于学校焉。治教休明,曰惟先觉,故表之官师,而绳其最者,为名宦传,予以别贤否、昭劝惩,故官师继之以名宦也。君师道立,人才奋矣,故表之选举,而拔其尤者。为乡贤传,予以甄淑慝,决从违,故选举继之以乡贤也。又有留绩、寓贤之附于名宦,封赠恩荫之附于乡贤,则以过化之遗,于邑有禘,余庆之萃,于乡有光,表以出之,示不忘也。阳教修矣,阴教焉助,故扬其贞烈而女德纪焉,为其足以维世风也。^①

可见,方志中的每一项记录几乎都是为了扬善抑恶、美化风俗。所以,地方志为我们研究儒学社会教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每一种史料都有其局限性。地方志一般都是官修,或者是由士人自修,因此体现的是官方的立场,如内容上倾向于正统史料,人物上倾向于社会上层与地方精英。而且在劝惩史观的主导下,许多方志在人物和事件的选择上使用同样的标准,因此,各地的方志在编写上呈现出雷同的风格。但是,对企图探视明代民间生活样态的研究者来说,地方志依然是其必需的资料之一。

^① (明)田瑄.万历《新昌县志》·新昌县志略述[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25,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64.

二、已有研究成果

在教育史领域,儒学社会化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较早的,如张惠芬教授曾对社会教化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并指导两位研究生从事先秦和清代的社会教化研究。在教育通史类著作中,李国钧、王炳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有专章探讨中国社会教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丁钢教授主编的《近世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则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入手,分析明清以来的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的内在关系,说明了宗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丁钢教授主编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中也对中国社会教化的心理传统问题和运作制度方面作了探索。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都与本书的研究主题相关。如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1)对明清民间宗教与民间社会的研究,包筠雅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对明清功过格的研究,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1997)对近代儒学地域化的研究,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对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衣若兰的《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对明代女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本着“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的史学观,以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展示了主流文化与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复杂关系。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与明代儒学教化有关的某一领域或问题的研究成果。如董建辉所著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聚焦于“乡约”这一社会基层组织,从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两个不同层面,结合一些典型个案的深入分析,系统阐述了明清乡约的发展历程,作者指出,因为明清乡约偏离了吕氏乡约的发展轨道,沦为封建王朝统治民众的工具,与吕氏乡约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乡约地位的降低和乡约长的官役化,乡约的弊端日趋严重,教化效果每况愈下,所以乡约最终必

然与封建王朝一道,退出历史发展的舞台。该书对明清乡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流弊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从儒学教化的角度审视明代乡约在儒学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与功能。在文学研究方面,司徒秀英的《明代教化剧群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以《五伦全备记》等明代著名的教化剧为主要探讨对象,说明了社会中对道德伦常的要求已经凝成了一种绝对道德,并展示了各种忠义形象包括妇女与商贾的道德形象的教化意义。作者认为,以道德伦常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教化剧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宣传体,在达到了它的教化作用的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社会对忠孝节义的标举和当时人们在忠孝节义这面旗帜下的生存状态。

对于儒学社会化的研究,黄书光教授早在《论儒学社会化的若干途径》(《教育史研究》,1992-1)一文中就对儒学教化的若干途径,如谕俗乡约、家规族法、祭祀活动、戏剧小说等作了理论阐述。2005年,由黄书光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出版。该书“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①围绕这一主旨,全书从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审视,到社会教化政策的价值导向、组成社会教化网络的学校系统与非学校系统、社会教化载体中的日常读物、地方绅士的教化理想与实践、宗教与教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等,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教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千秋教化”图。在理论探究方面,该书对中国社会教化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分析。该书所用资料范围之广是以往教育史研究所罕见的,举凡有关教化的资料,如史集、论著、方志、政书、谱牒、笔记、小说、戏剧、诗歌,乃至传说、民谣等都在收集运用之列。资料的丰富为该书确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使得“中国社会教化”这一历史图像也因此而生动。作为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中国社会教化问题的著作,《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是教育史专业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和新探索。

至于断代的明代儒学教化研究,笔者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专著。另外,还有其他相关的论文若干篇,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

^① 黄书光,主编. 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前言.

研究视角。本书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儒学教化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第二节 儒学教化研究基本概念的诠释

一、教化与教化权力

(一) 教化

教化是透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视角。“教”和“化”二字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国语·周语》认为：“教，文之施也。”《说文》对“教”字的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①。“化”，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像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说文》解释为：“化，教行也。”^②在中国古代，“教化”是一个人文性很强的概念。新版《辞海》认为“教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政教风化，也指教育感化，如《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二比喻环境影响，如《史记·三王世家》：“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③上述阐释说明了中国古代教化的目的是“化人”与“美俗”，在实施上不主张用外在的强制力，强调环境陶冶，追求通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④的功夫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中国古代教化的实质。

“教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在两个层面上被使用。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指一种和政治处于同一高度的治国方略，所谓“美教化，移风俗”正是此意，它是儒家治理国家的理想途径。这是与中国两千年来的德治主义传统相适应的。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因为德治与教化通常是一对孪生子，所以在历代各朝，统治者总是把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略。教化的目的在于对民众进行管

①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影印本:69.

② 同上:168.

③ 辞海(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175-4176.

④ 戴望.管子校正[M]//诸子集成·五.北京:中华书局,1954:28.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12.